

《松游小唱》：与岷江历史文化的对话

张宗福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成都 611830)

摘要:近代四川著名羌族诗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是一本纪行诗集。诗人从都江堰到松潘,足历岷江河谷的松茂茶马古道,岷江河谷的雄奇壮美的自然山水、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随时触发诗人的灵感,与诗人形成超时空的对话。岷江河谷的历史文化、藏羌民族文化在这一对话中得到鲜活的展示,《松游小唱》也因此而获得深刻的文化意义,并在新的现实语境的对话中不断生发与丰富。

关键词:董湘琴;《松游小唱》;岷江河谷文化;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5;I207.9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3-0131-07

文学是在与历史与文化、现实与未来的一次次对话中完成,文学的文化意义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羌族诗人董湘琴的纪游诗集《松游小唱》不但诠释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诠释着岷江河谷丰富的文化意义。这里居住着藏、羌、回、汉等民族,这里有大量的文化遗迹,这里有丰富的历史传说。岷江河谷雄奇壮美的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随时触发着诗人的灵感,诗人在与岷江河谷的自然山水、历史与文化、现实与未来的一次次对话中,最终完成他的《松游小唱》,并且以其优美的诗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时刻打动着我们。《松游小唱》的文化意义在董湘琴的笔下不断生成,在读者的阅读中不断延伸,在一代代诗人沿着董湘琴的足迹吟咏的诗句中不断丰富,在新的现实语境中生发新的意义。

一

董湘琴(1843—1900),名朝轩,又字湘芹,号玉书,都江堰市(原灌县)虹口人,羌族,他一生创作颇丰,如《腕腴精舍词赋》、《百花潭诗集》等,却多已散

佚,仅存《松游小唱》及为数不多的诗赋联文。诗人幼而好学,天资聪颖,精通文史,擅长诗赋。年轻时风流俊雅,豪侠任性,自负不凡,尝以戎马书生自命。其精妙之思,隽永之词,非同辈能望其项背,“先辈皆以翰苑相期”。然时值清末,朝政衰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董湘琴虽经纶满腹,抱负宏伟,却怀才不遇,人到中年才取得贡生的功名。由于诗人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参加了反清民间组织——哥老会,被尊为“冒顶”,诗人也因此而坐牢,还是他的狱中长联把他解救出来,不久便与世长辞^[1]。

在19世纪末,在松潘厅总兵夏毓秀的反复邀请下,董湘琴从都江堰虹口出发,沿着岷江700里松茂古道(亦称灌松茶马古道)前往松潘。岷江峡谷独特的地理地貌、恬淡的山水画卷、朴实的民族风情在诗人的笔下一一展现。诗人情随物移,诗由景生,写他人之未写,发他人之未发,题材的独特性导致了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松茂古道是川中盆地联结西部高原的纽带,“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脍炙人口的民谣把古道上富有特色地名、地形、地貌作了生动的概括。董湘琴每到一处都发而为诗,抒

收稿日期:2009-01-16

基金项目:本文受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重点课题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张宗福(1965—),男,四川汶川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

写他的感受。正如他在《松游小唱序》中所说：“《松游小唱》者，松潘之游，随游随唱也。曷唱乎尔，自来名士从军，才人入幕，就所阅历，发为诗歌。”^{[1]6}同时，700里的岷江河谷不仅山川雄奇壮美，而且其文化形态丰富，拥有大量的文化遗迹与丰富的历史文化传说，这就使诗人与历史上的传说以及人物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成为可能。董湘琴的《松游小唱》就是在一次次对话中完成，它的文化意义也在一次次对话中生成。

在《松游小唱》里，诗人首先展开的是一次与自己的家乡都江堰的历史文化的对话。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是战国秦昭王时期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所建。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誉为世界奇观。《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飨其利。”^{[2]1407}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载：“冰乃壅江作邕，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汗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曰：水汉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3]202}镇夷关（亦称玉垒关）在虎头岩之上，是松茂古道的起点，也是鸟瞰都江堰美景的最佳位置。伫立西门斗犀台上，举目四望，家乡的美景尽收眼底，诗人想到自己将远去松州，对家乡的无限依恋油然而生：“镇夷关高踞虎头。第一程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峦，蔚然深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尽夷犹，故乡风景谁消受？”^{[1]10}与此类似的是对白沙（今紫坪铺）如诗如画的描写：“行行至白沙，路转西斜。平畴入望野桑麻，流水小桥，是一幅苏州图画。舟人自舟，筏人自筏，生涯在水崖。回首灌城，茫茫雉堞残阳下。长桥竹索横空跨，过桥来，柳荫闲话。”^{[1]12}紫坪铺原是有名的水陆码头，上游的漂木在此扎成木筏，漂往成都、重庆，“长桥竹索”即安澜索桥，又名夫妻桥。安澜桥是名播中外的古索桥，位于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横跨内外两江，长500米。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3]230-231}。《水经注·江水》载：“渡江有笮桥。”^{[4]卷五七三,496}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

“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从白沙经茶关到龙溪，诗人被岷江峡谷的雄奇景观所震撼：“龙洞前，摩崖大字：‘关塞极天’，洞头流水响潺潺，千寻石壁撑霄汉，外衬着藤萝点染，恐黄荃、米颠，笔无此健。周道如砥直如弦，平镶石板。恰趁着鱼鳞天晚，雁齿桥边，诸峰林壑，尤美在西南。”^{[1]18}在董湘琴的这些诗作里，我们不难发现都江堰雄构江山的描写，在诗人的笔下，岷江是如此汹涌，江声是如此的喧闹，而蕴涵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灵岩寺、圣塔、伏龙观、观凤楼、二王庙又是如此的错落有致，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都激发诗人对故乡都江堰的无限热爱与眷恋。

岷江峡谷风物与景观相当独特，给董湘琴的创作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受。诗人在他的诗作中不断地与这些风物和景观进行对话，与此同时，诗人从未忘记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次对话，因为岷江河谷文化与华夏文化早已融为一体。董湘琴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历史传说，不断化用古代诗词歌赋正是这种对话的表现。历史传说与诗词歌赋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因而，这种对话不只是诗歌创作中所谓的用典，它是古代文化在新的语境之下的传承与新的意义的生发，它为历史文化的新的阐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岷江峡谷是全国有名的干旱河谷，最大的特点是风沙大、气候干燥，从气候湿润的都江堰来到这里的董湘琴对这种气候的感受是相当敏感的：“日当午，风正酣。若遇大王雄，纵乌获、孟贲也称不敢。扬尘扑面，吹平李贺山，杜陵茅屋怎经卷？”^{[1]32}大王雄即大王雄风。宋玉《风赋》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淅滂，激飏嫖怒。耿耿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萸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憺憺栗栗，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5]693}乌获、孟贲，战国力士，岷江河谷的大风，他们也难阻挡，何况一介书生的诗人。李贺山，据李贺《浩歌》

云：“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6]72} 此借其意。大王雄风非楚王专有，在诗人的情感世界里，虽然对岷江河谷的风有几分惧怕，但是，那种新奇之感也溢于言表，他也有“快哉此风”的感叹，那种科场失意，怀才不遇的郁闷被此风一扫而尽。从都江堰到松潘，虽有七百里之遥的奔波，却也有实现抱负的希望。诗人巧妙地将宋玉《风赋》中的“大王之雄风”、乌获与孟贲的传说，还有李贺《浩歌》中的诗句以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贯串起来，与岷江河谷的风形成对比，历史文化中的“风”与诗人现实世界中的岷江河谷的风和诗人的情感世界进行一次深层的对话，从而生成新的“风”的诗歌世界，也生发新的文化意义。

岷江河谷的风物与景观、置身其中的诗人的真切感受与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对话，成为董湘琴诗歌的主要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在《松游小唱》中随处可见。岷江峡谷千转百回，峰回路转，诗人从汶川的板桥到七盘沟，将沿途独具特色景观稍加点染，便展现出一幅幅轻快明丽的画面：“板桥早发七盘沟，残月如钩。……山明水秀，好风景在场头。萧萧竹木天容瘦，水碓鸣榔，闲点缀花间篱豆，却少个临风招展旗飘酒。……攀跻到岭头，望威州绝似齐州，云烟九点。”^{[1]46} 在诗人的眼里，既有七盘沟早上的残月如钩与风景的山明水秀，又有萧萧竹木与花间篱豆；既有诗人对秀丽山水的赞美，也有诗人的惋惜——“却少个临风招展旗飘酒”。不仅如此，诗人攀跻到岭头，居高临下，威州城尽收眼底，于是，李贺《梦天》中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与诗人的眼前之景，在情感与艺术上都达到契合，因而生发出“望威州绝似齐州，云烟九点”这样的诗句，诗人在与眼前之景、自我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对话中，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在诗人的笔下，汶川威州城完全是一幅边塞图景：“绝塞暮云横，凉月又东升。姜维城下起笳声，隐约闻击贲。山深况复又秋深，西风飒飒肩舆冷。何处远人村，烟火迷离，茅屋柴门，疏篱透出寒灯影。不必雨纷纷，已是行人欲断魂。猛抬头，威州已近。”^{[1]52} 《三国志·蜀书》载：“（延熙）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维率众讨定之。”^{[7]卷四十四·1064} 绝塞暮云，凉月东升，古老的姜维城显得格外的苍凉，胡笳声起，又凭添几分悲凉。姜维因黄皓的谗言，借屯兵威州城而避祸，姜维城不仅是历史文化遗迹，它积淀着忧谗畏

讯与放逐。这与远离故土北上松潘的诗人而言，在情感上达成契合，形成历史文化与诗人自我情感的对话。松潘镇江关的山水颇有特色，诗人倍加赞赏：“行数里，峰尖如笔，曲曲弯弯真仄逼。见一处烟火稠密，溪似若耶，渡若桃叶。柳暗花明，山清水碧。”^{[1]128} 到了松潘，地势开阔，土地平旷，江流宛转而舒缓，那种幽深的险峻的岷江河谷一去不再，给诗人的印象是深刻的，神思恍惚，仿佛自己置身于江南美景，诗人想到了浙江的若耶溪，想到了南京的桃叶渡。“溪似若耶”，即若耶溪，浙江绍兴县南，相传为西施浣纱处。“渡若桃叶”即桃叶渡，今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在眼前之景的描写与诗人惊喜之余的遥想之中，诗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塞上江南的美丽图画，这正是艺术创作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二

岷江养育了中下游灿烂的巴蜀文化，也养育了上游悠久的藏羌文化。对于董湘琴而言，对话远未结束。沿着岷江而上的诗人不断感受着独特的藏羌文化的独特意义，在与蕴涵着藏羌文化意蕴的历史、民间传说与故事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的对话之中，进而使藏羌文化意义在他的《松游小唱》的创作中不断得到展示与生发。

岷江河谷不仅有众多奇异的自然景观，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文景观，这些人文景观蕴藏着丰富的藏羌文化内涵。岷江河谷素有大禹故乡之称，禹出于羌，在古文献里多有记载，相传夏禹于六月六日生于汶川县飞沙岭（俗称风岭）上的剽儿坪。《史记》之《夏本纪》有关于禹的记载，唐司马贞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川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引《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2]卷二49} 《元和郡县图志》云：“广柔故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剽儿畔。”^{[8]812} 《旧唐书·地理志》载：“汶川，汉绵麓县地，属蜀郡。晋置汶川县。……石纽山，亦在县界。”^{[9]卷四十一·1688} 《四川郡县志》说：“广柔，今汶川县地。《輿地纪胜》引《元和志》云：广柔故城在汶川县西七十二里。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地名剽儿坪。”^{[10]6-7} 所述略同。禹文化不仅是羌族对本民族祖先的追问，也是华夏民族追溯其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诗人在

经过飞沙关时,感于这一历史传说,盛赞大禹疏通九河的功绩:“飞沙岭连飞沙关,岩刊石纽山,相传夏后诞此间。《蜀王本纪》:禹生广柔,隋改汶川县。凭指点,刳儿坪,地望可参。今古茫茫,考据任人言。我来访古费盘桓,总算是尽力沟洫称圣贤。有功在民千秋荐。”^{[1]34}诗人将禹羌文化的历史与传说巧妙地融入自己简练的诗句之中,将大禹的历史功绩的盛赞融入自己对历史的追怀之中,于是,禹羌文化的意义在诗歌中显现,在诗歌中生成。与此相类的诗句:“过桥去,涂禹山。瓦侍土司,蜀国屏藩。”^{[1]44}“涂禹山”,在今汶川县绵麓岷江西岸,相传大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于此,此山因此而得名。“瓦侍土司”,川西北嘉戎藏族十八土司之一,因先祖有功分封于汶川,建官寨于涂禹山。我们在这里不难发现,诗人有意将大禹在涂禹山娶涂山氏的传说,与川西北嘉戎土司之瓦侍土司在涂禹山建官寨的历史联系起来,历史、传说与现实在诗人的艺术世界里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对话,“涂禹山”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在此得到生发与丰富。

汶川县有天官坟遗迹,董湘琴路经此地,探寻历史遗迹,发思古之幽情,并以“荆棘铜驼”的典故喻社会将发生大的变化:“山势渐微平,滩声远不闻。山鸟山花多雅静,且稍停,来访天官旧日坟。惜无有传记碑铭,何朝何氏起家声。翁仲已斜倾,石人石马荒榛困。怪不得荆棘铜驼、周伯仁,都感慨到河山风景。五龙飞剑不须论,野语齐东姑妄听。”^{[1]50}“天官旧日坟”即旧时留下的天官坟,天官,商代官名,唐代称吏部,这里可能埋有高官,现在仅有岩洞穴,又称“悬棺穴”。“荆棘铜驼”即指晋代具有远见卓识的索靖,知道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曰:“会见汝在荆棘中。”周伯仁经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与过江诸人聚会时叹息道:“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而落泪。“五龙飞剑”,传说天官坟前有此地形^{[1]50}。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诗人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追问,既然商代的天官在此安息,那么,整个华夏文化一定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诗人由天官坟的荒凉与衰颓,而引发对历史兴亡的慨叹,当诗人的目光从遥远的古代回到他生活的世事多变、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诗人就像晋代那个远见卓识的索靖一样预见到中国近代社会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诗人把历史传说与文化的追问置于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追问深远,思考深刻。威州即今

之汶川县城,三国时姜维所建,唐置维州,宋改为威州,又名新保关,旧有无忧城之说。诗人不仅把地处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之处的威州三山竞秀、二水争流、古城高耸的壮丽图景展现出来,而且穿插唐代李德裕防吐蕃侵扰而筹边的历史事件:“威州自古叫维州,城号无忧。三面环山一面水,李文饶旧把边筹。冤哉悉怛谋!牛、李从此生仇构,怀古不胜愁。”^{[1]54}李文饶即李德裕,曾为唐剑南节度使,在薛城等地建筹边楼。李德裕筹边,率悉怛来降,而牛僧儒拒而不受,悉怛冤死,以至边患不断,牛、李二人也因此而结怨^{[1]54}。在这里,诗人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威州的风景,而是将李德裕筹边之事融进自己的思考之中,诗人思考的是一个深层次的民族问题,政治家应该怎样处理民族问题,民族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可见,诗人在与藏羌民族文化进行对话时,不仅展示藏羌民族文化,而且对民族文化意义进行深入思考。

七百里岷江河谷,七百里茶马古道,在从未间断的岁月中演绎着历史、文化与丰富的传说,这些历史、文化与传说又与生活在这里的藏羌等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是在与这些历史、文化与传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民族文化的意义也同时在这种对话中得到鲜活的展示、生发以及丰富。茂县这个被董湘琴称之为“神禹乡邦”的地方,留存着大量历史遗迹。茂县以南七公里,岷江东岸临江有一石洞,形状如鼓,河中又有石如龙,当地遂有此民谣:“石龙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董湘琴行到此处写下这样的诗句:“七星关,关名伴月。白水寨,水白如银。石鼓石生成,却少个张生歌文,昌黎题咏。犁渊沱水静无声,杨木坪,杨柳依依似故人。周仓故里孰传闻。”^{[1]54}韩愈《石鼓歌》云:“张生有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1]549}茂县较场为古代练兵之处,1933年大地震,形成三个堰塞湖,为今日“九寨环线”著名景观,还有历史遗迹点将台与孟良城:“较场路平,尽是石板镶成。将台留古迹,龙池对面横。不觉又过孟良城。”^{[1]58}将台即点将台,相传为余太君点将台,至今保存完好,点将台为一巨石,石壁四周刻二十三龕摩刻,有佛像人物八十九个,题记十九则,其中摩刻题记为“大唐贞观四年翼州知州立”,由此可推断点将台为唐代遗迹。巨石上有一洞,刻有“石洞临秋”四字,相传为著名道士张三丰息留题。“龙池”在叠溪海子西面,与较场隔江相望,传说境内有一湖,有白

龙蛰伏，遇晓吐烟，似月光照映，旧为叠溪营八景之一。孟良城，相传余太君挂帅西征，因其步将孟良在此驻扎而得名^{[1]58}。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黄龙风景区，也有一些令人神往的故事传说。董湘琴在他的《松游小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走归化，路太长。幸遇着‘王道荡荡’，不是那鸟道羊肠。此处山溪，源远流长。每逢三月桃花浪，流出些鲢鲤鳊。头上一点红光亮，这群鱼历有考详。均为龙子龙孙，西海龙王。土人爱惜，不敢罟网，洋洋围围出大江。指点此是丙穴旁，黄龙古洞通行藏，此水不寻常。高架輿梁，济人来往。从此安澜镇伯阳，不敢陡涨，永叫人平安无恙。”^{[1]134}“鲢鲤鳊”，此地特有的冷水鱼类，鱼头上的红点，相传为黄龙真人在鱼群朝拜时所点。“王道荡荡”即道路宽阔平坦，王道，古称仁道。“洋洋围围”指鱼儿摇尾而游。“黄龙古洞”即松潘黄龙风景区。据传距岷江乡三里的龙安塘附近有一洞穴，其水为地下湖泊，可通黄龙^{[1]134}。

不断的对话，使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显得格外的鲜活，民族文化的意义也在他的诗行中不断展示、生发与丰富。独特的藏羌民族的民风民俗藏于岷江河谷，藏于民间，正因为如此，它像岷江之水一样显得那样绵长、那样鲜活。岷江峡谷地势险峻，溜索可以说连结两岸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也成为藏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董湘琴在他的《松游小唱》里作了如此描写：“场口闲游玩，人行溜索飞如箭。恰似猿猴。小流连，也要算书生涉险昏花眼。红日坠西山，行十里，抵桃关。”^{[1]28}羌族妇女的装束服饰与民族风情，让诗人大为惊叹：“太平山口忽然开，平畴非狭隘。左是杨柳沟，右是萝卜寨。夷人妇，装束怪，两个大锡圈，当作耳环戴。青布缠头，红毡腰带，白衣黑裙大花鞋，别有一番气派，可为万国入种图上载。”^{[1]110}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民族，董湘琴一到茂县，便被羌族女性婉转悠扬的山歌所打动：“金风引我城头望，郭外隐斜阳。听班马萧嘶，何处韵悠扬。一曲铜鞮，蛮娘归去山腰唱。”^{[1]68}“金风”，古人以秋季属金，秋风亦称金风。“铜鞮”，曲名。藏族信佛教，松潘境内多寺庙，这是岷江河谷独有的人文景观，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寒烟日暮，番寺唱优婆，风吹隔河声断续，一声声似念弥陀。又只见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1]72}《松游小唱》还表现了民族生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平夷堡，太疏落，烟火数家，若断若续。桥畔一溪通岩壑，峰顶

积雪，寒光映林麓。问土人有何生活？出入深山无穷谷，置弩埋药，要待獐鹿兔鹿。山珍可口，衣丰食足。行数里，一大陆，扬鞭策马真快活。耕者自耕，牧者自牧。一童子骑牛唱歌，远闻山谷。虽唱无腔无曲，也算是田家趣乐。”^{[1]124}岷江河谷正是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过渡的地带，董湘琴的诗展示了这一地带少数民族的农耕、田猎、放牧的特有生活方式。与此相类的诗句，如：“得胜堡，好柳林，垂杨垂柳青复青。芳草如茵，任牛马横行。牧童歌唱听难明，啾啾怪声。马嘶对应，骡叫俱惊。日之夕矣，三百维群。此处物产多繁盛，却少了隔水榭风亭，留待诗人题咏。到街来，十分清静，板桥上犹有霜痕印。隔岸好山村，下寺地名，黍油麦秀，原隰匀匀。振精神，再往前途奔。莫作江淹恨。”^{[1]138}

热情好客，也是藏羌民族淳朴民风的表现。如：诗人在经过汶川过街楼时，受到当地的社会名流尚家昆仲的热情接待，《松游小唱》这样写道：“十里过街楼，驻马场头，整冠束袖，特地访名流。尚家昆仲吾与侔，白眉犹说后来秀。故勿论，九世明经，吾乡罕有。只这腹笥便便，果真是文坛耆宿。一笑登堂语不休，清茶一瓯，强如坐对闲人酒。非我爱勾留，是西来好友，是生平畏友。欲别又绸缪，殷勤话旧，大丈夫各有千秋。赠言强当临歧柳，抵多少河梁携手，送我在雁门口。”^{[1]56}过街楼，即汶川县东小集镇，相传此地有李卫国公阁楼，即李德裕所建筹边楼之一，宋代范仲淹题有“岷山起风，汶水腾蛟”八字。“白眉犹说后来秀”，《三国志·蜀书》：“马氏五常，白眉最良。”^{[7]卷三十九,982}此处用以喻尚家昆仲之才。“腹笥便便”即满腹诗书。“河梁携手”，古诗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诗人在藏族集居的松潘也受到热情的款待：“主人翁已出门迎接，何妨下马度今夕。杀鸡为黍，金瓯鼎食。诗向会人吟，恰恰切切，良宵风景真难得。忽听鸡鸣催起舞，我要效前朝祖逖。待明朝过箭岩，又一番行息。”^{[1]130}他乡遇知己，彻夜长谈，恰恰切切，志趣相投，相见恨晚。

三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说：“我们——人——是一种对话。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惟发生于对话中。可是，对话不仅仅是语言如何实行的方式，毋宁说，只有作为对话，

语言才是本质性的。我们通常所谓的‘语言’，即词汇和词语的结合规则的总体，无非是语言的一个表层而已。那么什么是‘对话’？显然是彼此谈论某物。这时，说，乃是彼此通达的中介。不过，荷尔德林却说：‘自吾人是一种对话，且能彼此倾听’。能听不光是彼此谈论的结果，相反倒是彼此谈论的前提。”“自从诸神把吾人带入对话，自从时间成为它所是的时间，吾人此在的根据就是一种对话。”^{[12]230-231}在这里，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的本质发生于对话之中，并由此推断出，我们——人——是一种对话。可见，对话，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换言之，我们因对话而存在。然而，语言只是为我们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对话也只是一种方式而已，在语言与对话的背后隐藏着文化，于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与文化密切相关。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我们认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也是一种对话，是诗人与岷江河谷藏羌文化以及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说的一次次深层次的对话的结果，它既是岷江河谷文化的展示，也是岷江河谷文化意义的生发与丰富。我们不仅能倾听这一结果，而且还能以此为前提进行对话，因此，从《松游小唱》产生那天起，围绕《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的对话从未中断，并且因现实语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它的文化意义也在对话中不断生发、丰富。

如果我们把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放在中国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化意义的挖掘这一角度来审视，它具有首创意义。诗人张大成认为，《松游小唱》是“我国最早、最长、最解放的旅游诗”，“开旧体诗革新的先河”^{[1]156-157}。如果把注意力放在题材的开拓、文化意义的挖掘上看，“最解放”的评价是非常精当的。著名诗人贺敬之也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松游小唱》在我国传统诗歌形式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诗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1]156-157}关于它“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这一评价，就是建立在董湘琴与岷江河谷的藏

羌文化以及历史传说的一次次对话，以及对民族文化意义的不断生发与丰富之上的。熟谙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在关于诗歌的讲话中，对《松游小唱》大加赞赏，并随口吟诵其中的精彩段落^{[1]156-157}。毛主席的评价也与董湘琴《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的历史文化的深层对话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在新的语境中对《松游小唱》的评价，也是与董湘琴以及其作品的对话。在每一次对话之中，《松游小唱》的文化意义都得到生发与丰富，并且不断促进人们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与深化，时至今日，能大段乃至整篇背诵的也大有人在，更有人带着《松游小唱》走古道，仿作新诗，由此可见，这种因《松游小唱》而展开的与岷江河谷的历史文化的对话远未终结。

“5·12”汶川特大地震，使整个岷江河谷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文化重建自然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各种设施的修复或重建与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已经成为文化重建的焦点，因为这些设施与历史文化遗迹是我们与古人进行对话的桥梁，所以，灾后的重建一定要把握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次地震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羌族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灾后重建绝不能停留在复制的水平上，岷江河谷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如相传大禹出生地石纽山剝儿坪、大禹娶妻的涂禹山、大禹之都的萝卜寨、姜维城城墙、点将台、筹边楼等等都需要重建或修复，民族文化、民风民俗都应当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保护与体现，藏羌民族文化是连接岷江河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换言之，岷江河谷的灾后文化重建是我们当代人与岷江河谷历史、文化与藏羌文化的又一次深层次的对话，而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为灾后文化重建提供了参照与依据，它作为桥梁与纽带为我们实现与岷江河谷文化的对话提供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在历史文化深层次对话基础上的灾后重建，一定能够使岷江河谷的文化意义得到进一步的生发与丰富。

（本文受到四川大学教授张志烈先生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大明先生的启发与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清)董湘琴. 松游小唱[M]. 张宗品, 张文忠等注.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4.
- [2](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 [4]酈道元. 水经注[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清)王琦. 李贺诗歌集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7](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8](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龚煦春. 四川郡县志[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 [11]屈守元,常思春. 韩愈全集校注[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 [12]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M]. 孙周兴,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Song You Xiao Chang : A Dialogue with Min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ZHANG Zong-fu

(Chinese Department, Aba Teacher Norm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1830, China)

Abstract: *Song You Xiao Chang (Tunes in the Pine Forest)* is a collection of travel poems by the famous modern poet Dong Xiangqin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The poet travels from Dujiangyan to Songpan, following ancient Song-Mao Cha Ma Route along the Minjiang valley of splendid natural spectacle and age-old rich ethnic culture, which touches off the poet's inspiration and conduces to *Song You Xiao Cha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Song You Xiao Chang* gives vivid expression to the histo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Zang nationality and Qiang nationality along the Minjiang valley. It is therefore of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develops in the new realistic context.

Key words: Dong Xiangqin; *Song You Xiao Chang*; Minjiang valley culture; 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唐 普]